

# 古代小说中所表现的非理性心态

## ——古代小说文化与传统社会人格的剖析

孙丽华

**【提要】**明清时期，小说里的现实品性提升，关涉到人生各方面的主题几乎都得到了表现。除了一些表现社会生活的现实题材，对于一些更加个人化的性格、心理问题，小说也有所探讨。而内心的放纵、偏执等方面的表现。让我们看到小说作者们已经关注人内心的非理性层面。这样的表现，对于深入认识人性自然是极具价值的。体现了古代小说在人文领域里达到的深度。

**【关键词】**文化人格 非理性 放任 偏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2)03-0113-06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重视个人修养。儒家的人生理念可以概括为三大层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sup>①</sup>我们可以看到，修身是作为首要命题而处于基础地位的。在古代圣贤看来，一个人如果不能有效地约束自己，就根本无法承担家国大事。

虽然许多小说家会更加着眼于那些重大题目，表现一些杰出人物的才能与功业，但人的品性参差不齐。人们在努力约束自己趋向理性和良知，但许多时候人们又会表现得缺乏自制、放任，屈从内心的非理性冲动。此时人们表现出来的就是欲望的泛滥或者修养的匮乏。而人们如果缺乏必要的个人修养，终究会给自己的生活及周围的人们造成许多问题，这也许可以归纳为“细节决定一切”。而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高度重视自我节制，无论对于社会还是个人而言，当然都是在理智上走向稳健与成熟的标志。

明清时期的一些通俗小说以及文言小说都

对于个人修养命题具有相当关注。小说家总是想通过他的故事，对芸芸众生予以谆谆告诫，称之为“苦口婆心”也全然不为过。这主要体现在题材的选择、小说的立意以及故事的情节设置，在这些方面，都表现出作者明确的说教意图。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并不是单纯讲故事或者猎奇，而更为注重教诲世人。

### 一、卢楠：诗酒风流让他入牢狱

比较典型地表现文人的狂傲不逊的小说是《卢太学诗酒傲王侯》，<sup>②</sup> 隐居乡间的名士卢楠，颇具才华，家境富裕，性格十分倨傲。当地官员汪知县久闻其大名，有意登门拜访。卢楠倒也愿

<sup>①</sup> 参见《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明德于天下，又：修身为治国之本，孟子：《离娄上》天下国家，天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sup>②</sup> 冯梦龙：《醒世恒言》第29卷。

意接待,觉得汪县令既然懂得欣赏卢家的园林之盛、诗酒之雅,就应该算得上是有情趣,可以共饮闲谈做个朋友。但是事不凑巧,宾主之间一连数度相约,都因为客人临时有事而爽约。卢楠从冬天赏梅开始邀约,一直推延到春观牡丹、夏赏荷花、中秋赏月、晚秋赏桂、赏菊,恰巧经历了一年四季,尽管好客的主人数次恭候,汪知县却都因公务繁忙而未能赴约。而最后一次邀约居然导致二人反目。起因是一个误会。县令出于客气,对前来相请的卢府家人说,次日一定早去,家人传话时,却说成知县大人“一早就来。”卢楠只得让仆人连夜备办酒席。一贯懒散的他勉为其难地大清早就起身,与众陪客一同恭候县令。但是不巧这一天县令遇到一件棘手的人命要案,久审不决,直到日落西山,才勉强结案,匆匆赶去卢家赴约。不想卢楠从清早等到午后,已很不耐烦。县令的确不够守时,但既然“官身不自由”,应属无奈。卢楠却没有想到这层,却因屡次空等,渐生不忿,感到汪知县似乎是有意戏弄他,于是恼羞成怒,命家人紧闭大门,与众宾客尽享美酒佳肴,自去沉醉,让姗姗来迟的汪知县吃了闭门羹。

这一场误会竟然引发了一桩冤狱——感到被怠慢而心生恼恨的汪县令存心报复。恰巧卢家有个佃户与管家发生争执后病死,汪知县就捕风捉影,捏造伪证,硬说是卢楠欲强占佃户之妻,将佃户殴打致死,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将卢楠缉拿入狱,严刑拷打。汪知县离任后,有个樊御史察知此冤案,开释了卢楠,已经升任京职给事的汪某立刻上了一本,说樊御史受贿买放,结果樊御史丢了官。卢楠又重被缉拿入狱。汪某手段如此毒辣,以后的历任官员就再不敢过问此案。卢楠身陷囹圄长达十几年,后来总算有一位新任知县陆某有胆识,审明案情,上呈按察院,开释了卢楠。汪给事又打算参劾陆知县擅放罪犯,然而按院已将案情上报,最终是汪某被罢了官。出了狱的卢楠从此深自敛抑,再不敢任性行事,也算是从灾难中汲取了教训。

考察这一事件,确有几分荒诞离奇,卢楠与汪知县的交恶,完全是事出偶然。如果那一次次失约,县令不是必须去迎候上司,或审理要案,而能够按时赴约,想来也会诗酒言欢、缔结友情

吧。这两个人本无嫌隙,只是因为一些意外枝节产生误解,竟然就让现任父母官那一片结交良朋的美意变做挟怨构陷的毒谋,在这个过程中,县令心胸狭隘、滥用权力固然不足取,卢楠也有意气用事、缺少涵养的性格弱点。如果他能够多一些体谅和包容,两人的矛盾应该就不会激化。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两方都缺乏足够涵养,偏狭易怒,终于酿成一场横祸。

## 二、秋先: 陷身缱绻的护花人

如果说像《卢太学诗酒傲王侯》这样一篇小说在从前那段政治话语过度活跃的年代里会被解释为“官僚阶层腐败弄权、欺凌平民”,而使人们忽略它表现个人修养问题的实际内涵,那么冯梦龙的另一篇小说《灌园叟晚逢仙女》也同样具有这种容易被误读的歧义。小说中塑造了一位孤傲的隐士秋先。他厌弃功名,只喜莳花栽树。他的园子里一年四季鲜花不断,硕果累累。而秋先又刻意防范世俗之人的干扰,对那些非分的闯入者绝不肯让步通融。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在这样一个排斥世俗趣味的老人身上,表现出的是文人所欣赏的隐士风范。他淡漠富贵荣华,一心致力于美的追求。然而对于某种人生理念的过度关注,让这个老人已经进入一种偏执地步。而对于这种不知变通、缺乏宽容的心态,传统文化一直是否定的,因为它有违“中庸”之道。这样的偏执人格往往使人难以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可能会导致很多矛盾纠纷与冲突。正如孔子所言:“勇而无礼则乱”,以及“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sup>①</sup>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述,那就是我们不应该“得理不让人”。过度强硬已经是不知变通,而如果对于某种恶劣行径强硬抵制,往往会引发激烈冲突。果然,正当秋先陶醉于牡丹竞放的美景之中,危机却降临了。一个花花太岁张委从这里路过,强行要进来赏花,尽管秋先一再推拒,不愿接纳,张委却硬闯进来。又摆出酒肴,细品慢饮;秋先已经忍无可忍,孰料张委又对这个百花争艳的园林起了贪占之心,打算强行收买。这让秋先更气

<sup>①</sup> 参见《论语·泰伯第八》。

愤难当，一口回绝。张委觉得失了面子，又去任意折取含苞欲放的牡丹。秋先忍无可忍，与张委撕打起来。寡不敌众，被打得头破血流。张委还不肯作罢，索性让众家丁把牡丹打得一片狼藉，扬长而去。如此突如其来的施暴，让秋先这个一向较真的人无法承受。但是这场噩梦尚未终结，狡诈的张委又到县衙诬告秋先是“白莲教妖人”，把秋先送入牢狱。

我们在这些紧张激烈的情节描写中感受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尖锐冲突。这里并不存在什么误解，对于倔强的秋先来说，他所面对的完全是来自外部世界的恶意侵犯。不过仔细寻绎，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是，在这一场激烈的性格冲突中，秋先自己其实也是构成对于美的象征——牡丹花的毁灭的一个要素——如果他能够采取冷静内敛的态度，无辜的牡丹花或许不会罹此劫难。当然，对于这一点，当辛勤的种花人陷身囹圄之时，内心也终于有所感悟。但是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将这篇小说的内涵确定为地主恶霸欺压劳动人民，这种将小说情节纳入某种政治模式的认知显然还是比较浅表的，而忽略了小说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入探析。

这篇小说中的两个人物对立更加激烈，因为他们的出发点是如此歧异。不像卢楠与汪知县，或者还有几分对等交流的可能，只是由于两人心性的褊急，友情生发的机会稍纵即逝。而秋先与张委的对立是无可调和的。一个辛勤培育、视花草树木为性命，对于无理侵犯毫不退让；一个贪婪成性，欲望一味扩张而不知自敛。这一场激烈冲突究竟会怎样收场？小说家忽然引出了世外花仙的飘然降临。这的确是令人惊叹的一转。看似游戏为文，实则举重若轻。如果作常规处置，无论让秋先含冤负屈、备受摧残；还是令张委受到清廉官吏制裁，似乎都仅止于对于事件的描写，停留在单一的是非评判，而难以引领我们进入深微的精神层面。所以，小说家在此点染出一片“神仙文字”，应该说是饶有深意的。它让小说既写实又超出事件的表现，探寻到人性的深微之处，颇有一些哲理性，无疑会给予我们深刻的启迪。

随着仙女的翩然而至，让无可调和的两造

冲突获得了令人满意的解决。仙女不仅施展法术，让落花返枝，也惩罚了邪恶之徒，还对秋先进行了忠告。秋先在仙女的点醒下顿悟自家的迷惑偏执。受贿滥权的知县也因为惧怕上天惩罚，匆忙翻案重审，开释了被张委诬告为“左道妖术”的秋先。解脱了牢狱之灾的秋先，对于自己的花园产生了新的感悟，对于这个倾注自己心血的造物，不再将其作为一种心灵上的束缚，而是大度地允许乡邻自由观赏，把自己的劳动成果慷慨地与他人共享。如此，他的造物就不再是他的桎梏和软肋，而是成为主人公达成精神自由的羽翼。我们看到的前后差异巨大的情景是：当秋先只盯着园子里的枝叶花果之时，他似乎预防了花果的损耗，却陷于心灵上的局促；此时的秋先是拘谨而苛察的，丧失了精神上自由；当他能够超脱地看待自己的成果，允许众人分享时，在精神上却上升到更加开阔自由的境地。他已经可以心平气和地摆脱事务的羁绊与束缚，达成心灵上的富有与自足。这种前后对比鲜明的变化，所体现的正是守财奴与心灵强者的差异。秋先最后“成仙”的结局不过是一个比喻，是一种人格超越达成圆融境地的象征性表现。

“境由心造”，人生的不同走向常常只取决于一念之间。在一些古代小说里表现出来的这种重视个人修养的意识，表明前人已经明显地认识到人的精神因素的重要作用，比起那些把人生变局归结为神秘莫测命运的被动态度，这种强调个人修养，力求在纷繁的世象之间寻觅个体自由的态度显然更具有理性，也要积极得多。

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应该说理解和体谅是奠定和谐美好的交往格局的必要因素。互相尊重与平等相待，永远是人们避免矛盾、减少争端的要诀。而骄矜傲慢甚至是肆意伤害只能让彼此之间剧烈冲突、势同水火。无论是卢楠那种非理性的骄慢，还是汪知县的喜怒无常和滥用权力；以及像《灌园叟晚逢仙女》中乡野君子秋先的固执偏颇、不知变通，以及那个典型恶人张委所代表的贪婪无度、惟我独尊，都是产生冲突和误解，制造事端的根源。

### 三、郑又玄：狂妄引他 走向穷途末路

《灌园叟晚逢仙女》也让我们联想到唐代的一篇小说《阎丘子》。<sup>①</sup>在格局、立意上这两篇小说颇有相似之处，《阎丘子》同样引入了神仙元素，采用离奇幻诞的表现手法，演绎了关于傲慢骄横的世家子弟郑又玄怎样在社会交往中连连失误，最终失去了成仙机遇的离奇故事。小说的主人公郑又玄为人傲慢，颇以自己的世家出身而自豪，总是对那些商贾匠作、三教九流之辈不加掩饰地表示蔑视。少年时代的同窗学友阎丘生门第低微。郑又玄对他很傲慢，当面斥责：像你这样的贫寒之人，怎么配与我们这些世家子弟为伍？就算我们不说什么，你自己难道不羞愧吗？阎丘生受到这样的抢白，羞惭无地，沮丧而归，再未露面。不久，传来阎丘生患病去世的消息，郑生也不以为意。后来他入仕做官，任职县尉。有个同僚仇生年纪很轻，是大商人的儿子。待郑生十分友善，时常馈赠宴请。尽管如此，郑生却因仇生不是士族出身，一直瞧不起他。一次，郑生宴请同僚，单漏掉仇生。别的同僚看不过去，提醒他把仇生请来。郑生有些惭愧，就派人请来仇生。可是当他向仇生敬酒时，仇生因不善于饮酒而推辞。郑生又不高兴了，发怒大骂说，一个市井之人，能和官员共饮，已经太荣幸了，竟然还推三阻四，真是不识好歹！仇生被骂得羞愧不堪，悄悄离席。从此不再到衙门办事，几个月后也病死了。后来郑生任职期满，也离开县衙，他一心向往神仙之道，在山中修行了十几年也没见成效，失去信心，又思漫游天下。一次在旅店遇到一个清秀少年，聪慧健谈，郑生感到自己远不是对手，钦佩又自卑。少年忽然笑着对他说，你不认识我了吗？我们还是老朋友呢！郑生很困惑。少年说自己曾经是阎丘生、仇生，与郑生有过两世的交情。郑生更是惊骇，不知所措。少年说自己其实是天上的神仙太清真人，奉天帝之命下凡来度郑生成仙，但一再尝试，都因为郑生太狂妄自大，而没能成功。还说郑生原是有仙骨的，不过因人品不好，已经没有希望当神仙了。说完，少年就

忽然不见了。郑生既惊骇又愧悔，十分沮丧，不久生病死去。

这篇小说当然属于寓言一类，我们能够感觉到它所蕴含的那种鲜明的人生实感。或许小说作者在生活中遇到过像郑生一样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的人物，让周围的人们都感到不愉快。而且无论怎样劝说教诲都没有办法让他改变自己的谬误，即使得罪势要之辈、尝到皮肉之苦就像卢楠那样，也不能让他翻然悔悟。对这样冥顽狂妄之徒，作者显然感到无奈，于是只好设计了对于凡夫俗子来说最不愿面对的现实，那就是彻底剥夺他的人生希望。小说中，郑生在经历了十几年的苦苦求仙学道之后，在将近衰迈之年心灰意冷之时，忽然知道自己原来不是凡庸之辈，身有“仙骨”，本有升格为神仙的素质，这该是多大的惊喜？但是刚刚得知这一秘密，却又被告知由于品行不佳，已经永远地失去了做神仙的可能，这又是何等的懊恼！这一喜一惊的心理落差太过巨大，一个人长久以来的心愿忽然被彻底粉碎，并且这种破坏并非出自他人，而正是由于自己的谬误所导致，这样的打击让人最难以接受。果然，狂妄傲慢的郑又玄沮丧失落了，头一次意识到，狭隘褊窄不宽容别人，最后是让自己失去机会。小说就以这样一个相当巧妙而富有心理震撼效应的构思，完成了一个惩罚的命题。小说并没有直接谴责郑又玄的粗鲁无礼、不能善待他人的品格瑕疵，而是以一种“恶行妨害自身”的逻辑，让读者意识到提高自我修养，决不仅仅是礼貌待人的问题，首先是与自身利益切实相关的要务。那么像这样一篇小说，应该说属于人生教科书的类型，人们在阅读它的时候，会联想到有关个人修养的许多问题。

### 四、泼妇与文士的殊途同归： 骄横苛刻酿成自我毁灭

由一个凡人升格做神仙的事情毕竟还属于飘渺虚幻，只能姑妄言之，现实生活中却确实

<sup>①</sup> 出《宣室志》，参见《太平广记》第52卷。

不乏因为修养欠缺而导致家破人亡的悲惨个案，更值得人们警醒，引以为戒。《醒世恒言》中还有一篇小说《一文钱小隙造奇冤》，<sup>①</sup>把观照的目光投向市井众生，表现了市井中的人们在利益和意气的争斗中如何走向毁灭结局。小说所反映的生活事件可谓惊心动魄。

故事由一文钱引发，结局是酿成了十余人丧命、两个大户损财破家的惨祸。起初是陶瓷之乡景德镇街上的两个小孩子在游戏中为争夺一文钱而吵闹打斗，两个母亲要为孩子出气，跑出来互相谩骂，窑户刘三旺的妻子孙氏口无遮拦，揭出争吵对手杨氏的私情底细。原来杨氏为人私行不检，有婚外情；两人冲突时，孙氏自然不会放过攻击对方的这一有力口实。但孙氏的话不巧又被此时归来的杨氏的丈夫、窑户丘乙大听到，就忿然去质问妻子，杨氏不肯承认，说对方是诬陷。喝醉的丈夫一时使气，竟逼迫妻子到刘家门前上吊，以表明自己的清白。杨氏被丈夫推出门外，哭了半夜，无路可走，真的去寻了短见。于是，这场只是由区区一文钱引发的纠纷，由于双方的不理智、不冷静，竟闹出人命。这个后果已经够惊人，但事情还远没结束。接下来波澜再起。由于杨氏心情慌乱，错在另一家门前吊死，那家怕惹上官司，就偷偷弃尸河边。此时有两个富户朱常与赵完争夺田产，朱常夜里带家丁出来抢割赵完的稻谷，偶然发现杨氏尸体，就将计就计，用尸体搞讹诈，在两家仆人争殴之后，谎称自家仆人被打死，让家人抬尸到赵宅闹事。赵完为摆脱危机，也采用同样办法搞讹诈，他打死一个患病仆人，反诬朱家，并将此事起诉到衙门。就这样，阴谋与罪恶之轮一旦滚动起来，就不可遏止地呼啸前进。局面终于完全失控，官司越闹越大，纠纷越来越乱。更多的人被卷入其中，最后导致十余人死去，引发的四起诉讼迁延数年，朱、赵两个富户都因打官司倾家荡产，并死于牢狱。统观此事，正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这篇小说与前面几篇在结构立意上大体相同。小说家没有对好勇斗狠的人物做直接斥责，而是让他们品尝自己恶行所酿成的苦果，编织了一个严密的“自作自受”的逻辑链条。行为不检的杨氏因为被孙氏毫不客气地揭出隐私而

颜面扫地，又受到丈夫的凌逼，让她走投无路，不得不上吊自杀；那么孙氏肆意揭出他人隐私岂非冷酷之举？而这种做法一向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所忌讳的。如孔子就明确表示，毫无顾忌地揭露他人缺失属于道德瑕疵：“攻其恶，无攻人之恶”，<sup>②</sup>就是说，人只能追寻自己的不足，而切不要指摘别人的缺欠。又如“恶讦以为直者。”<sup>③</sup>认为把指斥他人过失当作直爽乃是一种恶习，必然会引发人际争端。果然，随着杨氏的死亡，孙氏这个祸端的挑起人也揭开了自己厄运的序幕。杨氏既已被移尸，酒醒之后的丈夫找不到妻子下落，猜测她可能自尽并被刘家夫妇藏尸，就以妻子被人打死的事提起诉讼。官府将孙氏捉拿到案进行审讯，孙氏自然坚决不认帐，但因找不到尸体，问案官也怀疑是杀人藏尸，将她羁押审问。过度的刑讯和恶劣的牢狱环境使她体力耗竭，后来病死在狱中。看到这里，相信读者都会产生一种“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的联想吧。这种叙事手法应该说是含蓄的。

除了傲慢、暴躁、行为偏激等明显地带有攻击性的性格弱点，饶有意味的是，古代小说里也揭示了一些人们时常不会在意的、多属“内向型”的性格缺欠。例如过度地追求完美、过于执着等，这样的人看起来属于独善其身，尚不为大患，但是深入考察，其弊病也不可小觑。由于他们的固执而缺乏涵容，即使遇到一些很小的事情，也往往会使矛盾激化。

晚清宣鼎的小说集《夜雨秋灯录》里有一篇《离垢园》，内容很独特。主人公贾云章聪颖多才，家境富裕，应该算是一个幸运儿。可是他性格偏执，凡事苛求。他屡次科举失利，仕途无望。就把心力转向对生活趣味的追求。无论衣食器玩还是居室园林，都追求尽善尽美。一味地苛求，不但让他劳瘁不堪，烦恼不断，身边的人也备受荼毒。奴仆们偶有过犯，就引发主人的雷霆之怒，结果家中奴仆纷纷逃走，胆怯的就上吊投河；最后连一直柔顺的妻子都

<sup>①</sup> 《醒世恒言》第3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43页。

<sup>②</sup> 《论语·颜渊第十二》。

<sup>③</sup> 《论语·阳货第七》。

无法忍耐，寻了短见。自杀的仆人，其父母索要赔偿，而由于他沉迷于炼丹，失火延烧的邻舍也要赔付，这已经足以耗尽家产；愤怒岳父的“杀妻”指控更几乎将他送进监牢。贾云章的人生就这样轰然坍塌了。如此一个幸运儿——家境富裕，妻贤子孝，本人聪颖健康有才华，应该说上天待他不薄。他的不如意仅仅是科举不利，但是仍然拥有许多命运的恩宠，在旁人眼中足堪羡慕。而他却走火入魔，作茧自缚，最后竟走到绝路。幸亏有懂事的儿子出面替他忏悔谢罪，从厚补偿，终于说服怨家放弃追诉。然而贾云章能够幸免牢狱之灾。却不能免除“心狱”的惩罚。在一个离奇梦境里，他进入地狱，神祇对他的乖戾行径严厉斥责。意识到自己的丑恶与乖戾，他不觉冷汗被体；梦里又被发落投生为猪，更让他难以接受，发狂撞壁，却蓦然醒来。由此荒诞之梦，引起了贾云章对于自己乖谬个性的反思，而决意改过自新。从读者角度，当然看得很清楚，使贾云章陷于困境的并非来自外部的侵扰，而完全由于自身的偏执。正是由于他一直无法打开心结，才让自己的人生步步皆错，走向绝境。在小说结尾，贾云章由自以为是、苛察固执一变而为与世无争、随缘自适。以一种甘愿付出、体谅宽容的良性心态与他人周旋，进行着坚忍不懈的自我救赎。这应该是一个饶有深意的情节安排。

一个乖戾的人物最终走到原有性格的反面，变身为通达睿智之人，转变幅度固然极大，但物极必反，无往不复，这种个性的逆转应该说还是符合生活逻辑的。

### 结语

以上所列举的多篇小说作品，表现出人物的各种性格缺陷，佛家每以“贪、嗔、痴、爱”来概括世俗人们的各种心理病态，按此寥寥数字，其实已足以包容凡夫俗子之顽固根性。

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古代小说对于世俗人们诸多的心灵病症，不仅仅是展示弊端，也提出了救疗的希望。秋先克尽自省最终竟然白日飞升，跻身仙界；连贾云章这样一个曾经是无可救药的“心病”患者也在幻境中经受地狱冥司的严厉审判之后幡然醒悟，采取了全新的开放通达的人生姿态，最终为自己赢得了幸福美满的人生。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命运逆转，充分表明了小说家对于此类问题人物的宽厚期许，从而寄托了对于尚且处于冥顽状态的世俗流辈能够走向自新之途的深切期待。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古代室  
副研究员、博士  
责任编辑：马光

## The Non-rational Factors in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An Analysis of Classical Novels' Culture and Traditional  
Social Personality of China

Sun Lihua

**Abstract:** With the growing concern of secular life, almost every dimension of social life had showed up in novels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y. Besides, more personalized characters and psychological issues had been focused on. The presentation of internal over-indulgence and paranoia illustrated that novelists at that time had dug into the non-rational level of psychological filed. Apparently, such type of narration is significant to the penetration of human nature. Meanwhile, it reflects the depth achieved by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in the field of humanities.

**Key words:** cultural personality; non-rationality; over-indulgence; paranoia

©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